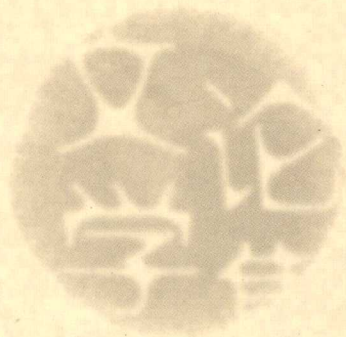


刘中树文学论集

刘中树 著

(一)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中树文学论集

刘中树 著

(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中树文学论集. 1/刘中树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12

ISBN 978-7-80720-915-7

I. 刘… II. 刘…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3036 号

刘中树文学论集 1 刘中树 著

责任编辑:潘莉莉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印:长春市新颖印业有限公司

印张:16.125

版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封面设计:宋宇航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字数:246千字

定价:48.00元

书号:978-7-80720-915-7

目 录

守正纳新 思理常青·····	(1)
就《阿 Q 正传》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冯文炳教授商榷·····	(9)
鲁迅的早期思想·····	(22)
开一代诗风的《女神》·····	(45)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50)
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67)
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一九三一—一九四九)·····	(85)
1931—1945 年间东北报刊有关鲁迅资料摭拾·····	(96)
论《伪自由书》·····	(105)
交相辉映的两颗巨星	
——追忆和茅公的一次谈话·····	(119)
关于《中国文坛近事》的说明·····	(123)
跋涉者的足迹	
——论萧军的短篇小说·····	(125)
五四文学革命主张再评价·····	(137)
鲁迅的文学比较研究理论初探·····	(148)
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发展与外来影响·····	(162)
鲁迅“为人生”的文学观·····	(178)
《冲积期化石》论析·····	(190)
鲁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5)
鲁迅和日本·····	(204)
在至平至实中显示至奇	

——鲁迅《呐喊》《彷徨》艺术谈之一	(227)
《阿 Q 正传》的“老生常谈”	(234)
鲁迅的“反抗绝望”与《一件小事》的创作	(241)
后记	(253)

守正纳新 思理常青

—

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宣传活动，使我受到了文学或者说文艺的启蒙。“九三”胜利之后，我一个少年跟随家庭走进了革命队伍，接受了解放战争的革命洗礼。那时，解放区军民配合前线的战斗，广泛开展了土改剿匪，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宣传活动。唱革命歌曲、扭大秧歌、出墙报、画街头画、演活报剧、街头讲演等等，使我开始接触了革命文艺。《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毛泽东之歌》、《七枝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歌曲，《兄妹开荒》、《白毛女》、《血泪仇》、《牛永贵挂彩》等戏剧，《小二黑结婚》、《高乾大》、《洋铁桶的故事》、《地雷阵》、《真假李板头》、《无敌三勇士》等小说，是我最初听到、看到和读到的革命文艺作品，这些也激发了我一个少年的最初的文学激情。那时读到的刊物有《白山》、《鸭绿江》、《知识》、《东北画报》、《生活报》等等，虽然不懂什么是创作，却也被这些刊物所吸引，初生牛犊不怕虎，与被称为“文豪”的哥哥一起学华君武画漫画，写小说，写读后感，向《东北画报》、《鸭绿江》等投稿，曾经为在《鸭绿江》上出现自己的名字而激动不已。1948年5月，我在东丰联中秘密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一位长相颇似日本人，戴着眼镜，据说曾留学日本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陈翼，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全中国解放后要建设新中国，要学习，教我们俄语，还介绍我们读文艺作品，讲高尔基的《海燕》，介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是我们又办起了东丰的“民青”刊物《东丰青年》，记得我曾不知天高

地厚地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分析思想状况的《这一阶段》、《论检讨》，一个 13 岁的少年“大言不惭”地写《论检讨》，现在忆起来还感到脸上发烧。可以说，除了前苏联电影外，我是通过解放区的文艺活动和文学作品而认识文艺和文学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的文艺理论文学思想的启蒙教科书；当时常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把现实搬上舞台，唱出大众的憎爱”，就是我对文学创作的最朴素的理解。

二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的胜利进军步伐，我进入了沈阳东北实验学校，开始了中学时代的正规系统的学习。从语文课里我又读到了古文名篇和鲁迅等现代文学名家的文学作品，知道了更多的中外文学大家的名字，丰富了文学知识，了解了主题、题材、人物形象、典型形象和典型环境、创作方法等概念，并拿起笔来练习写小说、散文、诗歌，有的还在学校创作比赛中获奖。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我的同学的家长中有著名表演艺术家田方、于蓝，作家雷加、庄启东、罗烽、白朗，有当时东北日报的总编等等。记得 1951 年在北京田方、于蓝家里所感受到的艺术家的风采的深刻印象，使我对艺术家、作家有了些感性认识，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因此在 50 年代高中毕业生都热衷于报考理工科专业的时候，我却自信于自己的口头和笔头的能力，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而考入了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

怀着当作家的理想，憧憬着捧读中外名著，到农村、工厂深入生活，时刻都在构思、写作的大学中文系的生活，我跨入了东北人民大学。而事实却不是这么回事，这里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语文学者，开的课是文学史、文艺学引论、语言学引论、汉语方言、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选与习作等等，刚入学时觉得与当作家的理想不一致，不免有些沮丧，想通了之后，也就取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于是我把自己的兴趣转向了理论。在跟着中外文学史课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的同时，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文学理论课吸引了我，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各种哲学与文艺的理论著作，马恩《论艺

术》、《列宁论文学艺术》、《毛泽东论文艺》、《斯大林论文艺》、前苏联学者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柯尔尊的《文艺学概论》，还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柏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批评著作、黑格尔的美学等等，以及前苏联学者的长篇论文，我都认真地阅读、钻研。特别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恩格斯《致哈克纳斯的信》更是我奉为经典而学习的文献。这些著作以其强大的理论力量和论辩魅力征服了我，成为我的文艺观的理论内核。我接受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作家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统帅作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典型论等等理论观点，这些理论思想在我年轻时写的论文如《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就阿Q的典型问题与冯文炳教授商榷》、《论鲁迅的早期思想》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都起着制导作用。这里既体现了一个年轻学者的理论信仰，也反映了一个年轻学者的某些理论幼稚和形而上学。

三

1958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我就一直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鲁迅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学习与研究鲁迅的过程中，从文艺观到方法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鲁迅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影响，使自己的文艺观——学术思想逐渐地成型、成熟起来，成为我的文学史观与文艺批评观的理论灵魂。

作为伟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他的思想方法更全面、更科学。他后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解决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问题，对文艺的本质、起源、功能等文艺的基本问题，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文学的国际交流和相互关系、文学的特性、文艺批评，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的世界观等等问题，都做出了科学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提出著名的“拿来主义”主张，他

译介过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等各种流派的文艺思潮和作家作品，他还译介过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尼采哲学等等，他勇于广泛涉猎，比较鉴别，决定去取，为我所用，显示了鲁迅对待外国文化的开放心理，有比较有鉴别批判吸收的自信心和融合创新的魄力。是高远的目标、明确的指导思想，开阔了鲁迅容纳外国文化的胸怀，赋予鲁迅勇于“拿来”的自信力，他认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特别指出“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所谓“运用脑髓”和“放出眼光”，就是说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识别判断事物的标准，独立思考，进行具体的分析，有鉴别有选择地吸收。他认为那种“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所以鲁迅特别重视正确思想的指导作用，后期则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时常论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意义，提醒人们多看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读物，读一点唯物论的基本书。鲁迅还特别强调了“比较”的作用，认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坟·摩罗诗力说》）比较的方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事物的逻辑方法，是显示事物特征，认识事物本质的科学方法。鲁迅深刻地阐述了比较方法对促进人们的认识趋向全面和深化的重大意义，他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只要一比较，许多事便明白”。（《集外集拾遗补编·致近代美术史潮论读者诸君》）鲁迅在肯定比较方法的认识意义的同时，还指出比较也有真伪之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分，他反对主观主义的乱比和静止的机械比较，坚持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辩证统一的历史比较的方法。为了保证“比较”的科学性，鲁迅强调要掌握正确的比较标准，他以形象的比喻生动地指出“‘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读什么书，就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认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这个“真金”就是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有了正确的理论标准，才能在比较中取得正确的认识，

鲁迅就是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以改良人生和建设新文艺为目的，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判断事物的标准，取材异域，外为中用，融合创新，铸就自己的真知灼见——史识的。比如“五四”以后，鲁迅和创造社成员都在从人性解放向阶级意识的觉醒转进，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是，鲁迅与创造社成员不同，创造社成员，尤其是从日本回国的后期成员，他们把“拉普”、“纳普”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到中国，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左的主张，而鲁迅则是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对苏俄、日本、中国等各派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进行研究之后，以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理论为基础，接受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文艺领域内的党底政策》的基本内容，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思考形成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具体主张和理论体系，且促进了他世界观的转变。鲁迅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广采博收古今中外先进的文化养料，融合创新，为我所用，不但没有失去自我的本质而且铸就了伟大作家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创作成就。他的文学观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与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对西方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清醒认识。对传统和外国文学观念，鲁迅既不是盲目地一概否定，也不是无原则地全盘接受，而是在打破旧的思想体系的前提下，为解决中国文艺实际问题，吸收中外先进的有用的思想学说，建立自己文学观的崭新内容和体系。第二，鲁迅始终一贯地坚持改良人生、改造社会的文学功利观点，坚持尊重文学特性，从二者的结合上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赋予他的文学观鲜明的唯物辩证法精神。第三，鲁迅没有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狭隘观念，他眼界开阔，既有深厚的国学底子，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又能广泛涉猎西方各种流派的文学思潮和理论，通过比较鉴别，自觉地弃取，丰富了他的文学观的内容，给他的文学观带来了现代的开放性特点。第四，鲁迅不炫耀空洞的名词概念，他踏踏实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时注意纠正自己思想的偏颇，从而打破思想学说的静止僵化状态，使他的文学观能始终处于变化发展的动态，永葆其常青的生命力和先进性。

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准确的理解，对待古今中外思想学理的容纳百川的雄大魄力、取精用宏的深刻思想和融合创新的高深造诣，过去和现在都具有

其现实的启示意义。比如鲁迅提倡借鉴外国的创作，却反对依傍和模仿，曾批评中国文艺界上的可怕现象，即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涵义，生吞活剥的乱用，“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三闲集·扁》）这些话不是就像是针对当今某些食洋不化的人而说的么！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者，我的学术追求就是终生学习、心仪鲁迅，尽管是难以企及的，但是却是矢志不渝的。我研究并写作出版《鲁迅的文学观》一书的过程，就是我的学习、理解鲁迅的文学观、思想学理的过程，他的思想理论，思维方式，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着整整一代人。

四

后期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扎实、独特而准确的掌握，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认识 and 解决中国社会和中国文艺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是我们无法企及的，然而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态度和科学精神给予我们的启迪却够我们终身受用的。在鲁迅那里，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的概念，装潢门面的抽象的口号，他自觉地生动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和分析解决问题，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品质，他后期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守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已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单纯视为一种西方的学说，而是把它作为指导自己实践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而形成的科学理论，鲁迅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不简单地拒斥其它理论思潮，是因为他广泛了解各种思潮理论，他才能在比较中科学地理解、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并能吸收人类创作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资料来丰富自己。是在鲁迅的指引下，我在不断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以其指导自己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同时，还广泛涉猎各种理论思潮的著作，什么

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我都努力去了解，以从多方思考来加深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形成具有个人特点的思想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把社会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以历史的逻辑的和美学的相一致的方法为核心，这是我所遵循的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基本的理论与方法原则。这就是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人的主体地位，把文学放到一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在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总体中和文学发展过程中，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思想和艺术的剖析，判断它的真实性，揭示它的社会功利作用和审美价值，从而做出历史的和美学的的评价。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握好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融合的历史批评，要以锐利的历史透视力，穿凿历史的深层，把握浩繁的史实，分析历史发展的进程，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站在理性思辨的高度，对文学从总体上进行历史的哲学思考，又对作品作出全面的艺术的考察，防止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片面性。要进行渗透着艺术审美感受的分析判断，发挥理论的深度和魅力的作用，做到倾向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伟大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它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根据是什么？怎样理解它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怎样评价它的功绩和历史局限？中国现代文学是怎样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以崭新的面貌取代旧文学，出现在中国文学舞台上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对上述问题，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标榜创新的答案，什么“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什么救亡压倒启蒙，有的甚至不顾历史事实，信口雌黄地否定茅盾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针对这些奇谈怪论，则力图在叙述史实中论述问题，使论点建筑在史实的基础上，史实为论点所统辖，充分肯定“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伟大意义，肯定“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新民主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阐明晚清和近代的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缺少的历史准备，近代的进步文学创作、文学革命运动、白话文运动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

绍等等，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它们又以自身的蜕变和失败，宣告了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才能完成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的史实和规律，是几个新名词和套用西方的人文主义杜撰的理论观点所无法改变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使它永葆其先进性。我讲授的《鲁迅研究》选修课包括鲁迅的思想、文学观和创作三部分，在具体论述中注意把三部分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说明问题，只有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才能对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有深入的理解。我的《鲁迅的文学观》一书，一方面注意防止简单化、片面性，在体系上摆脱按照文学概论的体系，引用鲁迅的话阐述问题的旧框子，另一方面也还注意从鲁迅文艺思想实际出发，提出能够较全面、科学地反映鲁迅文学观的主要内容的命题加以论析，努力以鲁迅所处的时代为背景，结合他的思想和创作实践，多角度多层次地做宏观和微观的分析，对鲁迅的文学观做出清晰、准确的阐述。应该说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正道的坚持，又是对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思潮、价值标准贬低、歪曲、否定鲁迅的“新论”的反其道而行之。

总结我的为学之道，不管我实践的如何，不外乎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意吸收古今中外的科学的思想理论，追踪新的思想成果，实事求是，相信实证的研究方法，守正纳新，永葆常青的思维活力和思想理论的先进性。

就《阿 Q 正传》的几个主要问题 和冯文炳教授商榷

冯文炳教授发表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上的论文“阿 Q 正传”^①，对鲁迅写作《阿 Q 正传》的思想情况、阿 Q 的典型性等问题的论述，很值得商榷。这里想就这几个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就商于冯文炳教授。

一

冯文炳教授的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鲁迅写作《阿 Q 正传》的思想情况，这是必要的。不过，他的具体论点却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冯文炳教授认为：“鲁迅写《阿 Q 正传》是针对他的本阶级的读者写的，他向他的本阶级讽刺阿 Q 主义”^②，为他们“开出反省的道路”，因为“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的彻底反省就是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一定要灭亡”^③。“他的思想里并没有什么农民不农民的问题”^④。他创作的目的是“针对着本阶级说话”^⑤。

冯文炳教授的这种论点是片面的、武断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冯文炳教授还提出些站不住脚的论据。

首先，他根据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所说的这样几句话：“……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

① 见一九五七年，二、三期合刊的《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冯文炳教授的论文写为“阿 Q 正传”，鲁迅的小说写为《阿 Q 正传》以示区别。

② 冯文炳：“阿 Q 正传”，《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一九五七年二、三期合刊，四七页。

③ 同上，四三页。

④ 同②。

⑤ 同②，四四页。

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便抓住“读者”二字为根据，作出判断说：

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这一点说明鲁迅写《阿 Q 正传》是要求读者反省。既然是“读者”，在那时自然是不包括劳动人民在内，那时的劳动人民大都不识字，谈不上读《阿 Q 正传》这样的小说的。反省又当然是反省《阿 Q 正传》里面所写的读者称之为阿 Q 主义的东西，首先是有名的精神胜利法。那么很明显，鲁迅写《阿 Q 正传》，是针对他本阶级的读者写的，他向他本阶级讽刺阿 Q 主义，他的思想里并没有什么农民不农民的问题。

其实，鲁迅那一段话的本意，是在于说明自己典型化的方法，并非是自己写小说的意图。鲁迅在那一段话之前，明明白白的说了“我的方法”是如何如何的话。所以，冯文炳教授抓住鲁迅那一段话做为自己论点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他根据阿 Q 主义在鲁迅前前后后写的杂文里反映的也不少，“不是旧日的统治者一流人的表现，就是旧知识分子的表现”，而下结论说，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鲁迅写《阿 Q 正传》是为了讽刺本阶级的士人。我们说这一个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冯文炳教授这个论据和冯文炳教授的结论是相矛盾的。诚然，鲁迅是写了许多篇杂文，用来挞伐“旧日统治阶级”和“旧知识分子”身上的“阿 Q 主义”，但是，却没有一篇是为他们开出反省道路的。第二，还不能不看到，鲁迅的杂文和小说虽然总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有着强烈的思想批判的特色；但小说和杂文毕竟是两种形式，两样武器。鲁迅在运用这两种不同的武器时，他的具体战斗任务多少也有些不同。杂文更多的是暴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小说取材则“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除了写“上流社会的堕落”而外，还写“下层社会的不幸”。显然，冯文炳教授不作任何具体分析，而把鲁迅写作杂文

的主观动机，来代替写小说的主观动机，根据鲁迅在杂文里所表述的概念来判断具体的小说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此外，冯文炳教授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他在举了《阿Q正传》第四章三个例子之后写道“所有这里的圣贤，商周，男女之大防，排斥异端，‘而立’之年等等，都是士大夫阶级的玩意儿，鲁迅明明是假阿Q之名加以讽刺”。不错，这是些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这丝毫也不能说明阿Q不是雇农。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阿Q身上沾染了统治阶级思想因素是毫不足怪的。不能据此就说《阿Q正传》与农民无关，只是讽刺士大夫阶级。当然，问题也不这么简单，这还必须做艺术上的分析，这就牵涉到作家创作特点问题。《阿Q正传》形象体系的中心无疑的是讽刺了做为雇农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作家形象构成有它独创性特征。鲁迅在《阿Q正传》的叙述人语言中，用杂文的笔法，一带而过借题发挥的向统治阶级投刺的几枪，虽是《阿Q正传》的有机部分，但决不是形象主体。因此，冯文炳教授据此而断定《阿Q正传》主要是写“士人”而不是写农民，也就根本不能成立。只能说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断章取义，不顾全文”。

冯文炳教授的论点与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了。那么怎样正确地解释鲁迅写《阿Q正传》的思想情况呢？我觉得，这必须首先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鲁迅当时思想里有没有农民问题？二、鲁迅总的创作目的是什么？

我们从鲁迅的一些言论和作品来看，鲁迅思想里是有农民问题的。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鲁迅熟悉农民、理解农民、热爱农民。冯文炳教授说：“鲁迅所熟悉的是城市里的生活，熟悉城市里的闲人，熟识象阿Q这样的人——阿Q这样的人不是农村的农民”^①，是不确切的。鲁迅自己说过：“比较起来，我还是关于农民知道得多一些”。鲁迅的《故乡》、《社戏》、《祝福》不仅说明他对农民生活是多么熟悉，而且，在这些作品里，他还满怀激情的描写了淳朴可爱的

^① 冯文炳：“阿Q正传”，《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一九五七年二、三期合刊，五五页。

少年时代的闰土，天真无邪、聪明能干的农家子弟双喜、阿发和淳朴的老农六一公公等。鲁迅对他们的优秀品德，寄予了无限的赞美之情。

第二，鲁迅了解中国的农村，熟悉农民的生活，对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榨下的农民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并为之忧虑、痛苦。在《故乡》里，鲁迅为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苦得象木偶人的闰土而叹息。闰土的生活景况就是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的生活景况。同样是在《故乡》里，鲁迅表示了自己对农民未来的新生活的希望。

第三，鲁迅看到了被残酷的生活折磨，和封建文化、伦理道德等等统治阶级的思想麻醉、愚弄得虽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的生活着，却不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榨的农民的愚弱，感到无比的痛心。他在《俄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述传略》里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①。这话足以说明鲁迅为中国农民的愚弱感到无比的痛心。

第四，鲁迅虽然以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启蒙主义者的胸怀，对在高压下挣扎的农民给以无限的同情，对农民的麻木、愚弱感到深切的痛心，但是，他并没有对农民表示悲观失望，而是寄希望于农民。鲁迅感受到了农民会倾向革命，走向革命，甚至他也感受到了中国要好起来，必须广大的农民都觉醒起来，走向自觉的革命。所以他在《故乡》里昭示农民：“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诚如邵荃麟同志所说的：“从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中，鲁迅深深感到农民问题的重要。在这篇（指《阿Q正传》——刘）和其他几篇小说中鲁迅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是‘哀其不幸’，更主要的是‘怒其不争’。这就是提出了农民要起来斗争的问题。”^②

① 《鲁迅全集》，七卷，七八页。

② 邵荃麟：《关于“五四”文学的历史评价问题》，《人民文学》，一九五九年五月号。